

# 枇杷名字误会多



## 谁先命名了枇杷?

原产于中国,在拉丁学名中以“日本种(japonica)”命名的植物,远不止枇杷一例。近代植物分类学是由瑞典植物学家卡尔·冯·林奈开启。林奈建立了植物学研究的双名制,即用拉丁属名和种名为植物命名,自19世纪以来称为植物学研究的准则。拉丁文至今延续着它作为学术语言的特殊地位,根据《国际植物命名法规》,每种植物只有一个合法的拉丁学名,并且以最早发表、符合法规的正确名称为准。此种命名方式沿用至今,遗留着西方殖民时代的鲜明印迹。枇杷的拉丁学名是“Eriobotrya japonica (Thunb.) Lindl.”。“Thunb.”和“Lindl.”是两位枇杷命名者的缩写。

“Thunb.”指的瑞典植物学家卡尔·彼得·通贝里(Carl Peter Thunberg)。通贝里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,曾经在日本待了一年多的时间,收集了800多种植物,被认为是“18世纪日本德川幕府时期最重要的见证者”。他在1784年出版了《日本植物志》,在书中,通贝里命名的动植物大约有254种,把“枇杷”命名为“欧楂属日本种”(Mespilus japonica)。枇杷之外,像郁李、秋牡丹这些原产中国的植物,也被通贝里打上“japonica”的标签。

“Lindl.”指的是英国植物学家约翰·林德利(John Lindley)。1821年,林德利把枇杷重新命名为“枇杷属日本种”(Eriobotrya japonica)。林德利曾经在英国约瑟夫·班克斯爵士的植物标本馆里担任助理,1787年,正是约瑟夫·班克斯资助英国皇家邱园从广东引入的枇杷。

有资料统计,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,在中国各地采集和制作标本的,大多是来自欧洲和北美的传教士、外交官、商人以及学者,记录在案的就有316人,采集的标本达到210多万份。不仅在中国,欧洲以外的地区,包括日本都是西方“植物猎人”们的乐园。

第一位向欧洲人介绍枇杷的,其实不是作为“林奈好学生”的通贝里和林德利,而是波兰传教士卜弥格。卜弥格于1645年来华,后为永历朝出使罗马,1656年在威尼斯出版了《中国植物志》。这是第一部系统地向欧洲介绍中国动植物的专著,书中介绍了31种动植物,包括23种植物和8种动物。

在书中,卜弥格直接用拼音标注枇杷,说枇杷的味道吃起来像欧洲的李子。在国外,枇杷也会被称为“日本李子”或是“中国李子”。

## 苏轼为何称“卢橘”?

在法语、西班牙语等语种里,枇杷都称为“日本欧楂”,英文倒是个有趣的例外。枇杷的英文是loquat,来自卢橘粤语发音的音译。英文里,这样从粤语音译过来的中国植物有不少,耳熟能详的比如kumquat(柑橘)、lychee(荔枝)、Longan(龙眼)和Pe-tsai(白菜)等。

枇杷本是楂,为何成了橘?根据北宋《冷斋夜话》的记载,这事是苏东坡认定的。苏轼有诗“客来茶罢浑无有,卢橘微黄尚带酸”。友人张嘉甫问苏轼:“卢橘何种果类?”回答说:“枇杷是矣。”张嘉甫再问:“有什么证据?”回答说:“事见相如赋。”

张嘉甫是个较真的,刨根问底接着问: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说“卢橘夏熟,黄甘橙橘;枇杷燃柿,亭柰(n à i)厚朴”,如果卢橘就是枇杷,那么《相如赋》不该这样重复用,东汉应劭在注释此处时曾引用《伊尹书》说:“箕山之东,青鸟之所,有卢橘,常夏熟。”为什么不以此为依据呢?

苏轼嘴硬,回了一句:“不乐意。”从这则掌故上来看,苏轼不太占理。苏轼诗中提到卢橘,名篇首选《食荔枝》:“罗浮山下四时春,卢橘杨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此外,还有“魏花非老伴,卢橘是乡人”,认卢橘当老乡,诗中说的都是枇杷。东坡先生诗文影响大,卢橘是枇杷的说法,就一直流传了下来。

卢橘到底是不是枇杷?历来有争议。《上林赋》与卢橘并提的黄甘、橙、橘,都是橘属。《魏王花木志》说卢橘又叫给客橙,“蜀土有给客橙,似橘而非,若柚而香,冬夏花实相继,通岁食之,亦名卢橘。”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则认定卢橘乃是金橘:“此橘生时青卢色,黄熟则如金,故有金橘、卢橘之名。”而“注《文选》者,以枇杷为卢橘,误矣”。

## 枇杷琵琶分不清?

明代褚人获《坚瓠首集》中,记了同代画家沈周的一则故事。有人送一匣枇杷给沈周,匣上误写作琵琶。沈周回信给他:“承惠琵琶。开奁(li á n)视之。听之无声,食之有味。乃知司马挥泪于江干,明妃写怨于塞上,皆为一啖之需耳……”

沈周回信,引经据典,打趣送枇杷的人说,原来白居易写《琵琶行》,王昭君弹琵琶曲,都是为了一口吃的。

那么问题来了,白居易诗中的琵琶和昭君出塞抱着的琵琶,是一种琵琶吗?

琵琶一词的由来,历代考证基本上都依据晋代傅玄的《琵琶赋·序》,此序中有两种说法。

一说是“故老云”:“《世本》不载作者,闻之故老云:汉遣使乌孙公主嫁昆弥,念其行道思慕,使工人知音者,裁箏、筑、箜篌之属,作马上之乐。”汉遣乌孙公主和亲,为了给公主在路上解闷,特意改良了一种可以在马上弹奏的乐器,“以方语目之,故云琵琶,取易传于外国也。”

另一说法是“杜挚说”,杜挚是三国时曹魏大臣。“杜挚以为嬴秦之末,盖苦长城之役,百姓弦鼗而鼓之。”鼗(t á o),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拨浪鼓,“弦鼗”就是给拨浪鼓加上弦。

傅玄认为,乌孙公主的说法更可靠,“二者各有所据,以意断之,乌孙近焉。”其实,从后世琵琶的演变来看,秦琵琶、汉琵琶都存在。在唐代,民间俗称秦琵琶为“秦汉子”,而汉琵琶被唐人称之为“阮咸”或“阮”。白居易有诗《和令狐仆射(y è )小饮听阮咸》:“掩抑复凄清,非琴不是箏。还弹乐府曲,别占阮家名。”阮咸是西晋“竹林七贤”之一,史载善琵琶。

唐诗中有关琵琶的名句甚多。“葡萄美酒夜光杯,欲饮琵琶马上催”“琵琶起舞换新声,总是关山别旧情”“行人刁斗风沙暗,公主琵琶幽怨多”……在唐人音乐生活中琵琶大行其道,唐代出土的伎乐俑群,不拿琵琶的很少见。唐人所吟所奏的琵琶,多是曲颈琵琶。唐琵琶演奏多用拨,源自印度,经西域传入,亦称龟兹琵琶。又有考证认为,曲颈琵琶源自中东地区的巴尔巴特琴。

直观区别是,汉琵琶应该是直柄圆体,而唐琵琶是曲颈半梨形体。

## 真是当年识字差?

明代笔记中,琵琶误作枇杷的故事还有一个。

莫是龙、袁福徵和屠隆都是明代书画大家。莫是龙和袁福徵是华亭人,屠隆时任青浦令(华亭和青浦说的都是现在的上海)。一次莫是龙到袁福徵家拜访,看见桌上有张贴子,写着“琵琶四觔(斤)”四字,两人不禁大笑。这时正好屠隆来了,问他们笑什么。看到帖子后,屠隆笑着说了一句:“枇杷不是此琵琶。”袁福徵接了一句:“只为当年识字差。”莫是龙听了,紧接了两句:“若使琵琶能结果,满城箫管尽开花。”屠隆大为赞赏,此后到处夸赞莫是龙的才华。

琵琶作“枇杷”,还真有说法。东汉刘熙《释名》说:“枇杷,马上所鼓也。推手前曰枇,引手却曰杷,象其鼓时,因以为名也。”

琵琶又作“批把”。东汉应劭《风俗通》载:“此近世乐家所作,不知谁也。以手批把,因以为名。长三尺五寸,法天地人与五行,四弦象四时。”

正因为有这些说法,据说送枇杷的人也做了一首诗,为自己抱不平:“琵琶本是这枇杷,不是当年识字差。若使琵琶不结果,江城怎得落梅花。”这事真不算冤枉他。琵琶写作枇杷,可以说有典有据,然而把枇杷写作琵琶,怎么讲都是无稽之谈。

北宋寇宗奭《本草衍义》说:枇杷叶“其形如琵琶,故名之”,这个说法同样流传很广。枇杷叶要说形如琵琶,也是形如唐代琵琶,《上林赋》就提到了枇杷,该怎么解释?私以为寇宗奭的说法不足取。

白居易有诗《山枇杷》:“深山老去惜年华,况对东溪野枇杷。”山枇杷不是真枇杷,是高山杜鹃。唐代诗人王建在《寄蜀中薛涛校书》有“万里桥边女校书,枇杷树下闭门居”,由此有了个“枇杷门巷”的典故。此句有争议,一说认为应该是“万里桥边女校书,琵琶花下闭门居”。琵琶花是什么花?据考证同样是高山杜鹃。

枇杷琵琶剪不断,理还乱,易上头。清代孙道乾写《小螺庵病榻忆语》,忆爱女病中言行。女儿得了肺病,宜食枇杷,先是问,枇杷花是不是款冬花?孙道乾说,不是,款冬是药草,生河北关中,十一二月开花,像黄菊,当时总有人用枇杷花蕊伪造款冬。女儿又问孙道乾:“卢橘到底是不是枇杷?”“琵琶为什么最开始称作枇杷?”孙道乾也是解释不清,担心女儿病重思虑过多,回了一句:“女儿你絮絮叨叨,是想给腊兄写本书吗?”正是枇杷名字误会多,识字未必说得清。(据《北京晚报》)